

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机制探析

——基于 14 所高校的调研

王 哲, 贾欣昊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实践育人是“大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树立协同意识,统筹实践育人主体、内容和平台,优化实践育人机制,促进多维协同,凝聚育人合力,是开展好“大思政课”的内在要求。本研究采取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 14 所高校进行调研,发现“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运行机制通过正向影响实践育人认同进而促进实践育人成效,实践育人的评价反馈机制和保障机制显著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分析基础上从统筹实践育人“三大机制”、促进协同育人成效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育人;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719(2025)3-0060-05

作者简介:王哲(1987—),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贾欣昊(2000—),男,河北邢台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收稿日期:2024-07-27 修稿日期:2024-08-3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这一命题是对新时代思政课守正创新、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的重要指示。与现实结合,就要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紧密结合,以实践育人。高校统筹“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主体、内容、平台和资源等育人要素,优化实践育人机制,促进多维协同共进,凝聚协同育人合力,是开好“大思政课”的本质要求和必然选择。目前,高校在推进“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时,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实践育人主体的责任划分不够明确,实践育人场域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实践育人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整合不足,“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机制仍有待梳理和完善,制约了“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效果发挥。本研究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深入分析影响“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效应的因素,系统构建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机制,对于推进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模型构建

“大思政课”是科学理论与时代特征、社会实践结合的思政课,是学校课堂与社会课堂结合的思政课^[2],是一项全局性、长期性、基础性的系统工程^[3]。“大思政课”协同机制是“大思政课”格局中有关主体和资源协同配合、共同推动思政课建设的运作过程和作用方式。高校需要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

度体系、搭建合作平台、强化评估机制、统筹各类资源、整合育人力量^[4]、优化育人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建立育人机制^[5-7]等策略推进构建“大思政课”协同育人工作格局,发挥协同育人合力。

(一)文献回顾

实践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促进形成实践育人合作机制和工作合力^[8]。高校实践育人长效机制是高校实践育人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之间不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和达到结构合理、功能完整、关系和谐、程序严密、运行持久的运动状态,不断促进和调节高校实践育人工作健康稳定发展的运行方式^[9],是保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长期、稳定、有效运行的系统性体系^[10]。

专家学者大多从高校实践育人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等视角,系统构建、分析高校实践育人机制、育人体系^[9-11]。针对“大思政课”视角下的实践育人研究,学界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大思政课”与实践育人的逻辑关系研究。“大思政课”旨在让社会现实生活成为思政课的源头活水,用社会实践的大平台为思政课的改革创新持续注入活力,赋予思政课以生动有力的实践支撑。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是“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鲜明特质^[12],实践育人是“大思政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善用社会资源以彰显“大思政课”实践品格^[13],聚焦实践、讲述实践,从丰富的

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创新理论,并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和进一步发展实践^[14]。二是“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存在的困境。主要包括实践育人校地协同运行机制不完善、学思与知行结合不够紧密、长效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协同发展育人特色不够鲜明、平台协同不足、实践教学队伍不齐、评价反馈机制不完善、质量保障机制薄弱等现实困境^[15-16]。三是“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实践路径。要以“大思政课”理念为指引,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价值导向、激励导向^[17],从实践育人的内容、形式、管理、机制、功能、保障等方面实现协同,构建实践育人协同体系,推动思政课实践育人内容的有机整合、载体的多维建构、目标的内在衔接、评价的有效协同,推进“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成效^[16]。

可见,已有研究将“大思政课”建设与实践育人相结合,从系统性、整体性视角探讨“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机制的研究相对匮乏,对实践育人的协同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探索不足,且相关研究以理论研究、经验研究、逻辑推断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尚未形成有效的逻辑链条。

(二)理论模型构建

本研究依据“认知—态度—行为”的逻辑,结合“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过程,重点分析学生感知到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运行情况对其实践育人认同以及实践育人成效的影响。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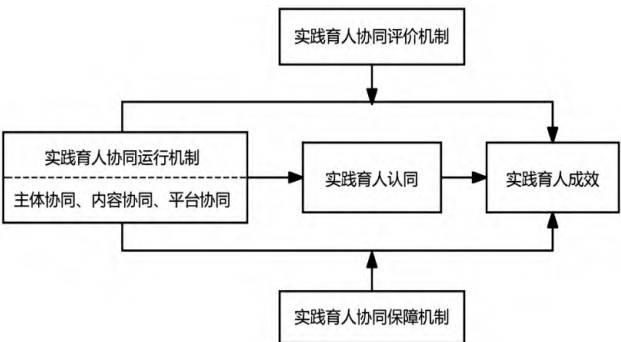


图1 “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机制理论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描述

本研究根据地域和高校属性,从东部、中部、西部选取北京、上海、河北、山西、湖北、陕西、云南等7个省市的14所高校不同年级在校生进行分层抽样。共发放3000份问卷,剔除不合格问卷,有效问卷共2650份。描述性结果见表1。

表1 样本描述性分析

变量	指标	人数	所占百分比(%)
性别	男性	1280	48.30
	女性	1370	51.70
学科类型	理工类	800	30.19
	经管类	640	24.15
	文史类	990	37.36
	艺术类	200	7.55
	其他类	20	0.75
年级	大一	380	14.34
	大二	370	13.96
	大三	700	26.42
	大四	420	15.85
	研究生	780	29.43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SPSS和Mplus软件,在对变量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三)结果与分析

1. 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地探讨了“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的核心维度即主体协同、内容协同与平台协同对实践育人成效的关键指标(即政治素质、精神品质、个人能力)的潜在影响,回归模型结果见表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首先,内容协同对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展现出显著的正面效应。其次,内容协同与平台协同均对提升学生的精神品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教学内容的有效融合及实践平台的优化利用对于塑造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具有重要意义。再者,实践育人的主体协同与内容协同均显著促进了学生个人能力的提升,强调了育人主体之间的有效协作以及教学内容的协同设计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实践育人的主体协同、平台协同对学生的政治素养提升的影响不显著,实践育人的主体协同对学生的精神品质提升影响不显著,实践育人的平台协同对学生个人能力提升的影响不显著。

表2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因变量		
		政治素养	精神品质	个人能力
控制变量	性别	-0.171	-0.168	-0.083
	政治面貌	-0.128	-0.140	-0.153
自变量	主体协同	0.096	0.017	0.301***
	内容协同	0.452***	0.354***	0.294***
	平台协同	0.101	0.238**	0.094
R ²		0.438	0.393	0.438
F		40.435	33.565	40.351

注: * p<0.05, ** p<0.01, *** p<0.001

表 3 回归模型结果

变量		育人认同	育人成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制变量	性别	-0.253**	-0.145	-0.069	-0.146	-0.125
	政治面貌	-0.333**	-0.130	-0.031	-0.118	-0.089
自变量	育人认同			0.300***		
	运行机制	0.619***	0.655***	0.470***	0.572***	0.552***
调节变量	评价反馈机制				0.131***	
	保障机制					0.172***
交互项	运行机制×评价反馈机制				0.144***	
	运行机制×保障机制					0.146***
R ²		0.408	0.486	0.547	0.533	0.562
调整后的 R ²		0.401	0.480	0.540	0.524	0.553
F		60.034	82.113	78.473	59.220	66.353

2. 协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的影响路径分析

依次检验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的主效应、实践育人认同的中介效应以及评价反馈机制、保障机制的调节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3。

第一,主效应检验。本研究以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为自变量,实践育人认同为因变量,加入性别、政治面貌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模型 1。研究结果表明: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认同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以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为自变量,实践育人成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模型 2。结果显示: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通过以上分析,不仅揭示了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在增强实践育人认同感和提升实践育人成效方面的显著作用,还通过纳入控制变量确保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第二,实践育人认同的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以实践育人认同作为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遵循中介效应检验三步骤进行检验。首先,依据模型 2 的结果可知,自变量(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因变量(实践育人成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其次,依据模型 1 的结果可知,自变量(实践育人运行机制)显著正向影响中介变量(实践育人认同)。之后,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中,构建了模型 3。在模型 3 中,我们将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认同共同作为自变量,对实践育人成效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认同均对实践育人成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自变量的影响效应减弱,故实践育人认同在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和实践育人成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第三,评价反馈机制和保障机制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消除共线性,本研究首先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了去中心化,之后构造二者的乘积项。模型 4 以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实践育人评价反馈机

制及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以实践育人成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5 以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实践育人保障机制及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以实践育人成效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评价反馈机制的交互项以及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保障机制的交互项均对实践育人成效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数据结果揭示了实践育人评价反馈机制与保障机制在调节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成效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即它们能够显著增强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的积极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如图 2、图 3 所示),结果显示,实践育人评价反馈机制与保障机制均显著正向调节了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成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结论及讨论

调研发现,“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成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主体、内容、平台等方面的有机协同,是“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统筹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地发挥各方作用,促进协同育人成效,是当下需要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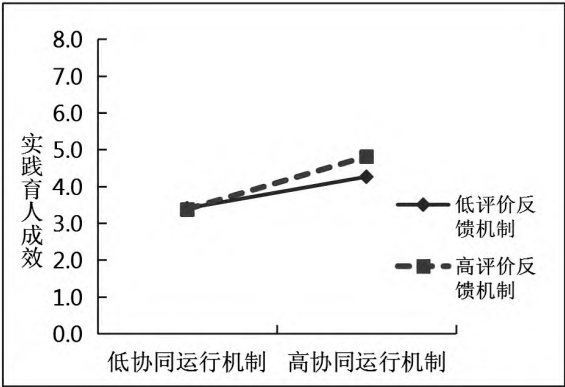


图 2 评价反馈机制调节效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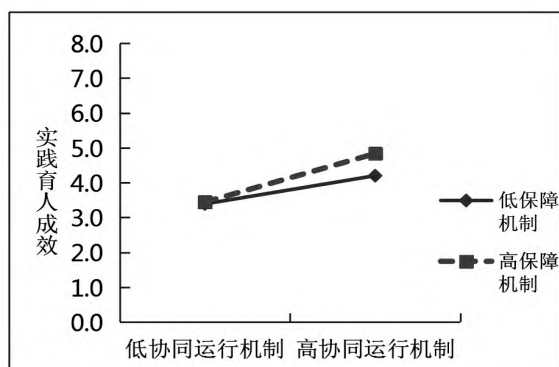


图3 保障机制调节效应图

（一）顺畅的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对实践育人成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实践育人运行机制是实践育人活动的策划、实施以及丰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操作模式，构成了影响和决定实践育人定位及其相关要素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体系，同时主导着实践育人活动开展的内外部因素和相互关系。“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主体、内容、平台等方面的有机协同，是“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运行机制。根据模型2的数据分析，“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运行机制显著正向影响实践育人成效。换言之，“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主体、内容、平台等方面顺畅配合、有机协同，能显著促进学生的政治素质、精神品质以及个人能力等实践育人成效的提升；反之，如果实践育人多元主体间权责不分，工作内容交叉重叠、脱离实际，校内外育人平台存在信息孤岛，无法实现有效协同，则会影响实践育人的效果。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思政课”的实践育人运行机制存在梗阻，如“大思政课”育人主体“单打独斗”，只把思政课教师作为实践育人的唯一主体，抑或“多而不一”，多方实践育人主体争霸擂台，权责不分。存在育人内容交叉重叠，让学生接受同质化内容等现象。实践育人平台缺少有效统筹和协作，各平台工作衔接不顺畅等问题，导致协同运行机制的内部要素无法实现有机协同，从而影响学生对“大思政课”的认同感和育人成效。因此，高校应该进一步统筹育人主体、内容、平台，推动运行机制协同。一方面，在深化“大思政课”主体协同中，要坚持将师资“引进来”，打造一支主渠道与主阵地紧密结合、校内外资源有机融合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师资队伍。除了思政课专职教师，高校应积极引进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朋辈榜样以及行业领军人物等社会育人主体，将其纳入校外实践育人团队，确保育人主体全员有效深入地参与“大思政课”的实践教学

与集体备课活动。在备课设计中，坚持以思政课教师为主、多元主体为辅，多维度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精神，提升“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针对性、实效性、感染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要统筹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和平台，实现育人内容与平台协同。首先要构建全领域、全方位、高衔接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内容体系。高校应组织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课程实践与劳动实践等实践归口人员和部门集体研讨，在教育前端制定协同政策、设计联动内容，强化反馈评估，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内容生产，避免实践育人的重复和漏洞，增强“大思政课”的部署全局性和能力针对性，让学生在多领域中潜移默化接受系统有序的思政内容。其次，构建完善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平台。打造实践育人信息共享平台和集体备课平台，确保校内平台与校外平台的协同发展，构建与思政课堂紧密相连、相互配合的校企合作社会实践基地体系，实现校内外实践平台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让学生在社会实践增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幸福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同时，还应重视将数字技术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灵活运用数字化资源赋能思政课，创新育人模式，提高育人效果。

（二）实践育人认同是连接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育人成效之间的桥梁

“认同”被视为个体态度形成的关键阶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等维度，涉及对特定对象、观念或群体的持续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它代表了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內化过程。对于“大思政课”而言，实践育人认同体现了学生在认知和情感上认可并接受“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有效性，并将其內化为个人的价值观念，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实践育人认同是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与育人成效之间的桥梁，是学生对国家、社会、学校等主体认同的重要途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关键在于促进学生个体与多元共同体间的价值观、目标、信念的匹配，以达成和积累更多共识。一旦学生理解并接受学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的共同规范，他们就更倾向于共同参与，从而产生更强烈的实践育人认同感和行动意愿。在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学生个体不断评估他人的认可和价值实现，构建或调整自己对团队情感、实践结果和奖励回馈等方面的认同。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模型1和模型3，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通过正向影响学生的实践育人认同，进而正面影响实践育人成效，实践育人认同在其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可见,在大主题、大师资、大平台的共同作用下,“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运行机制不断深化,通过构建和强化学生的实践育人认同感和组织认同感,促进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大思政课”的实践活动,从而培育学生的责任感、认同感、价值感,引导学生的家国情怀及价值观。

(三)完善的实践育人评价反馈机制和保障机制是协同机制的“加速器”

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协同工作能够得以实现,离不开构建保障与激励互促互进的保障机制。本研究的调节效应检验也证明了实践育人保障机制显著正向调节了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成效的关系。可见,完善的政策保障机制、发展保障机制,以及充足的经费支持和全面多元的队伍保障机制,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可以不断激发“大思政课”建设的内生动力,提升实践育人运行中的主体、平台、内容等方面的协同,进而有力提升实践育人成效。鉴于此,高校亟须优化组织管理体系,以促进多维度保障机制的有效协同。首先,要优化顶层设计。高校党委要发挥引领作用,统筹宣传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团委、学生工作部、研究生院等相关部门,组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工作领导小组。通过构建权责清晰、相辅相成的“大思政课”协同育人组织管理体系,制定并贯彻落实“大思政课”实践育人方案等重要制度文件,为“大思政课”实践育人的组织管理、实施、激励、考核评价等提供清晰指引。其次,要切实增强保障力度。充足的实践育人经费是支撑高校开展“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工作的基石与先决条件。高校要设立“大思政课”实践育人专项经费,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多渠道增加实践育人经费投入;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为实践育人活动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实践育人保障体系。

科学的实践育人评价机制是检验实践育人效果的总阀门。评价机制的创新与进步是确保高等教育实践育人与时俱进的核心要素。科学合理的评价反馈机制对于“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工作落实进度、实施效果具有监督管理作用。不仅能合理量化育人主体的工作成效,还能有效促使各育人主体主动调整并优化现行协同育人的工作模式,促进育人成效提升。本文的调节效应检验也显示了实践育人评价反馈机制显著正向调节了实践育人协同运行机制与实践育人成效的关系。因此,高校不仅要把实践育人工作作为对其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考核的重要指标,建立科学系统的“大思政课”实践育人考核评价

体系,从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实践育人效果对比评价等多个维度考核实践育人协同成效,还要设置多个学生意见反馈渠道,使学生能将实践育人中的感受、评价、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育人主体和育人协同部门,建立实践育人评价反馈的倒逼机制,推动评价反馈对实践育人工作的改进作用,进而促进“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成效提升。

参考文献:

- [1]杜尚泽.“‘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人民日报,2021-03-07(1).
- [2]沈壮海.“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考与探索[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37(3):26-30.
- [3]张士海.关于“大思政课”建设的几点思考[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7(7):105-112.
- [4]徐蓉,周璇.师资联动: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J].思想理论教育,2022(4):25-30.
- [5]石书臣,韩笑.“大思政课”协同机制建设:问题与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2022(6):71-76.
- [6]骆郁廷,周耀杭.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重在协同育人[J].思想教育研究,2022(6):121-127.
- [7]蓝波涛,覃杨杨.构建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格局:价值、问题与对策[J].教学与研究,2022(2):92-100.
- [8]教育部,中宣部,财政部,等.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2012-02-03)[2023-05-12].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6870/201201/t20120110_142870.html.
- [9]黄蓉生,孙楚杭.构建高校实践育人长效机制的思考[J].中国高等教育,2012(Z1):36-38.
- [10]王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育人机制创新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
- [11]陈步云.论高校实践育人动力机制的构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11):15-18,40.
- [12]徐蓉,张飞.试论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三重境界[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95-101.
- [13]冯秀军.善用“大思政课”的三个维度[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103-109.
- [14]赵春玲,逢锦聚.“大思政课”: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方向和着力点[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1(8):97-102.
- [15]张家玮.“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实践育人的功能定位与优化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6):146-152.
- [16]曹桢,喻一珺,王钰菡.“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社会协同机制探讨[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2):59-67.
- [17]任瑞姣.“大思政课”视域下加强思政课实践育人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4):135-140.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课题“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机制研究”(DJC23027)。

(责任编辑:任初明)